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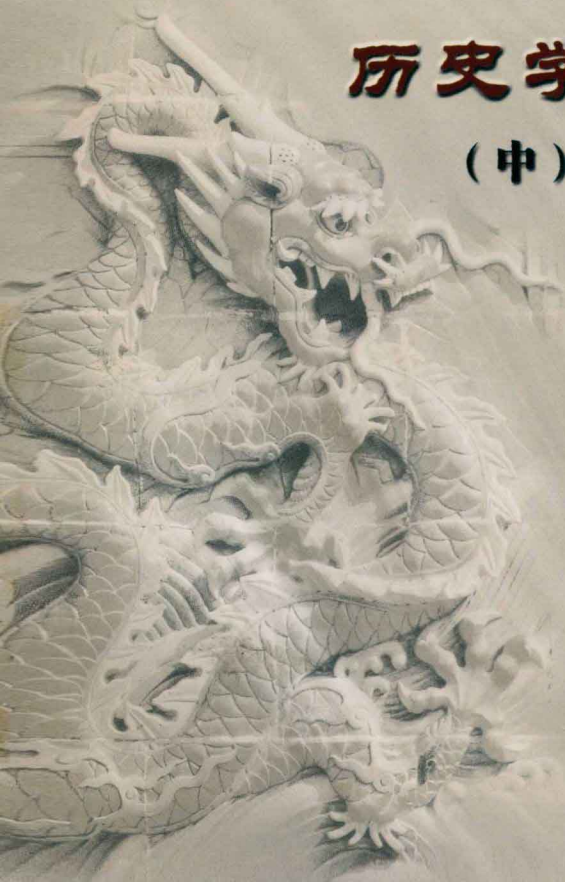
·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历史学卷

(中)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历史学卷
(中)



浙江教育出版社

民国时期佛教革新派的新文化观*

李少兵

20 世纪以来,传统宗教不得不顺应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而革新图存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与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亦深受其影响。民国佛教革新人士顺应时势,努力改革佛教,化解佛教与新文化的矛盾,力图使民国的佛教“人间化”、“现代化”。

佛教革新派研究新文化的动因,是他们认识到了不能忽略时间与空间变迁的重要性,不能违背时代历史。研究新文化的目的是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为此他们在行动上努力革新振兴佛教:改教制、组团体、辨佛徒、建学校、并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思想上认真学习、研究西学新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文化观。

一、五四时期佛化新青年的新文化观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潮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并很

* 本文选自作者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佛学与社会思潮》(导师为王桧林教授)第 2 章、第 3 章,并经过修订。原文 12 万字。

快在文化思想领域取得了足以与传统文化相抗衡的地位。面对新文化的冲击,佛界人士有的惶惶不安,有的麻木不仁,有的则对此持欢迎态度。佛界革新人士在认真学习新文化新思想,以便革新旧佛教,使之现代化的同时,也从维护佛教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新思潮是与佛学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佛学还可以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

与此同时,同样为新思潮所熏陶的新青年中,围绕宗教信仰的问题,分裂出了两大派:宗教新青年与非宗教新青年。前者认为对宗教不应全盘否定,一些宗教如佛教有其价值,真正的宗教不同于迷信,是人类社会必不可缺的。后者则断然否定宗教在现代还有其价值,认为宗教就是迷信,从而对一切宗教都大加挞伐。这样,两者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论战。

(一) 什么是佛化新青年和非宗教新青年

民国初年,人们对“新青年”有两种解释法。一曰新的青年,即接受新的学说、思想、方法、教育,脱离了陈腐落伍的旧学说、旧思想、旧习惯,而成为新少年的人。之所以把青年划入少年的范畴内,是因为当时有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即认为青年“就是少年人的美称”,因为只有少年人才享有青春年华。梁启超曾做《少年中国说》,视少年与青年中国为一体。王光祈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也视少年与青年为一回事。李大钊则有“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之语。^[1]傅斯年等人创办的新潮社,在评论《少年中国》这一刊物时说:“这种月刊……是纯粹青年的结合。”^[2]

陈独秀认为“新青年”就是指新的青年,并指出新的青年有六大特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当时对“新青年”的第二种解释法是把“新”当动词用,“新青年”指用最新的进步的学说、思想、方法来教化、熏陶青年,使其弃

旧变新,成为新人。

我们认为,第一种解释法比较适用于佛化新青年和非宗教新青年。这样,非宗教新青年就是指陈独秀所说的新青年中的反对宗教者。而佛化新青年还须我们详加解释。

所谓“佛化”,按佛化新青年的代表人物宁达蕴的解释,就是“以佛所说的方法,来作一种的文化”^[3]。这一解释有些含混不清。他接着就谈了自己对“佛”与“文”含义的理解:“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是“人格造就极度的名词,与宗教家所崇拜之神圣迥不相同”^[4];“文”指有事有理,有构造组织,是野蛮武断黑暗暴乱的对立面。但对于“佛化”、“文化”更确切的定义,他没有再讲,只是说“知此局义,而佛化与文化之义,从可知矣”^[5]。

佛化新青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陈维东,则对“佛化”的定义做了明确阐释。他说“佛”就是“一个有知觉者(无论人或畜等)到了如实觉知于‘宇宙万有之真性实相与其变化力用’的地位的称呼”。^[6]换句话说,陈维东所说的“佛”,是指众生中彻悟宇宙万物真理的觉悟者。他接着解释“化”是指教化、同化、变化。“佛化”就是说“诸佛以其教理方法化导一切有知觉者,便变化增进至于大觉圆满”。^[7]用今天的话来讲,其意为各种佛用他们的教义、理论、方法来教化指导一切众生,使其发生变化,产生觉悟,不断进步,最后达到彻悟宇宙一切真理的地步。

对于“佛化”,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解释。比如朗村认为“佛者觉也”。“佛化”是指人的本心与佛的精妙明净之心彼此相印,融成一片。佛心印入人的心中,使人也有佛心佛性,也能成佛。^[8]

陈维东与朗村对于“佛化”的解释比较接近,都强调佛与世人的觉悟与被觉悟的关系,都强调世间。从这一点上讲,“佛化”是重视社会重视世间的,是入世而非出世的。

那么,什么是“佛化新青年”呢?佛化新青年自己的解释是:青年中已经被佛法所教化变新了的人,或者能够领受佛法,有可能被

教化变新的人。我们认为这一解释还不够确切,过一会再谈谈我们对“佛化新青年”这一概念的理解。

当时,“佛化新青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以下诸人:宁达蕴、张宗载、刘仁航、傅丹如、邢定云、周浩云、杨蝶父、陈宝善、杨哲生、释悲观、释佛慈、释宽度等。太虚是佛化新青年们的导师,这可以从双方的通信中看出来,太虚在给《佛化新青年》月刊的主持人张宗载、宁达蕴的信中说:“望时时记清楚,是佛化的,非非佛化的;是新青年的,非非新青年的。以努力前进……希佛化新青年会早遍全国。”^[9]张、宁二人的回函对太虚处处充满敬意,俨然执弟子礼。信中说:“我师赐函,嘉誉非常,殷勤备至。……诸多力弱不任之处,诚乞我师大施法雨,帮助一切。我师之在中华,真我辈青年之指南针,佛门改革之不倒翁。吾会全体会员,亦当奉为化身菩萨。”^[10]佛化新青年们于1922年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1923年在武汉正式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并出版会刊《佛化新青年》。

佛化新青年向社会公开了自己要努力完成的八大使命:

第一,铲除旧佛教、旧佛徒的腐败污秽,发扬佛法的真精神,显露佛法的真面目,以真佛法为指导建设人间新社会。

第二,打破人们对鬼教神教中学西学的迷信,使世人觉悟,共同进入极乐世界,无烦无恼永享幸福快乐。

第三,用极慈悲极善巧的方法,影响更多的新青年,共同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使黑暗昏乱的人间世界,变成庄严灿烂的佛国。

第四,代人类受一切苦,替人类除一切恶,为世间去一切偏见邪见、贪念恶念。

第五,用佛化的救世方法,使人类彻底觉悟,以平等心,见平等性,立平等法,行平等事。去除贪、嗔、痴三毒^[11],完成真、善、美三德。

第六,化除男女之别,消灭字典上你、我、他三个字。使世人不

知道有你,不知道有我,也不知道有他,只知道“即人即佛”^[12]。

第七,以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大无畏的誓愿和力量去破除一切阶级,在十年内使世界处处都有佛化的新村、报社、公园、小学、中学、大学、工场、幼儿园、图书馆。

第八,促进医疗卫生的发达,使人类的生命免于夭殇,使人类生、老、病、死诸苦都能免去。

佛化新青年们还针对世人的误解,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宣传佛化,不宣传佛教。”他们认为“教”便是宗教,而宗教是坚持己见一味排它的。佛化则不然,是不持己见圆融各界的。“比方人饮水、饮茶、饮粥、饮咖啡、饮果子露,饮到腹内,滴滴同化。没有一点茶水粥饭的余味在里打架,这就叫佛化。”^[13]

“是要传播佛化,不是要传播新潮流新文化。”他们认为新潮流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而佛化以东方文化为本位,同时圆融吸收欧美文化。新潮流新文化根据契约论、资本论、互助论、统计论等,而佛化直指人的本心本性,以觉悟真理为准则。

“佛化新青年的名称,不过是随机结缘而起,并不限定青年。”因为佛法不主张有国界族界、人界物界、男女老幼的区分。不论年纪大小,只要愿意加入佛化,就算佛化的新青年了。

“佛化不一定要出家,不一定要念佛,不一定要读很多书识很多字,不一定不能信耶稣、回、道各教。”佛化新青年解释上述主张时说,“佛”的意思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佛只要求人觉悟,其他不计。而觉悟在内心,不在于外在的行为。

最后,佛化新青年指出:“佛化对于世界的意义,就是永断争杀,福慧圆满。”也就是和平幸福。

从上述佛化新青年的使命和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团体实际上是民国佛界革新派中的激进派,他们有勇气有干劲有热情,但不太务实,想在十年内创成一番佛化大事业就说明了他们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更不用说为人类除一切苦和恶了。佛化新青

年这一团体既有这样偏激革命的特点,其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也就不奇怪了。仅仅一年以后,即1924年,“佛化新青年会”就被迫解散了。

而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述、介绍,就可以给“佛化新青年”下这么一个大致定义:本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的,以改造旧佛教,启发世人觉悟,拯救时弊世弊,发扬佛法真精神,创造和平幸福的新世界为目的;以佛法为本,兼收东西文化并以之为用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佛界革新青年。

(二) 佛化新青年与非宗教新青年的论战

双方的论战,集中在宗教与现代文化、宗教与新思潮的关系等方面。双方争论的范围虽广,但谈的深浅程度却不同。非宗教新青年睥睨宗教,多对之硬性定论、简单斥责否定。而佛化新青年则深入分析,详细论证佛教与现代文明、与新思潮并不矛盾的关系。

从论战的结果看,虽然佛化新青年论证深入有力,但由于非宗教青年的力量过于强大,因此并未分出胜负,谁也没有说服谁。

由于非宗教新青年人数众多,而评判宗教又多以个人只言片语贬斥为主,因此我们在介绍他们的论述时,只有采取这样的方针:即综合归纳其单个言论,集中起来阐述,使这些言论系统化,便于大家了解。而佛化新青年单个人的论述就已具有系统性,我们对应前者,介绍他们反驳非宗教新青年的言论。

双方围绕着以下五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论战。

1. 宗教在20世纪是否过时。

非宗教新青年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物竞天择,是自然常理。当此20世纪,科学、哲学发达,宗教做为迷信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今日所谓鬼也神也,悉扫而空之,亦意中事也”^[14]。他们进而引用蔡元培的话“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来加强自己的论点^[15]。

佛化新青年争辩说:现行“宗教”一词,译自日本,而其定义,是

由欧洲人士下的。这个词不足于说明佛法的大义。因为佛法大义“皆拈花指月,托喻显化,既非宗又非教,宗自宗教自教,宗门一字不立,教相同是假名”。^[16]佛法既然不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宗教,就不应该把它和基督教、回教混为一谈,后两者的诸多弊病佛法并没有。佛法不设教主,认为人人皆可成佛。在佛法看来,佛祖也是由人通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转化成的,而不是什么神。

佛化新青年还指出,佛法并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明信。佛家所说的“信”,并不是盲目崇信之意,而是指“专诚向往,决定不疑”的信心^[17]。认为人们有了这种信心,才能学佛不怠,逐渐领悟佛法大义,而盲目崇信不求甚解的人,终究无法得佛真义。

他们进一步分析说,佛法注重的是心性修炼,彻悟真理,根本不迷信神鬼,不仅不迷信神鬼,连佛也不迷信,它是“佛魔同斩”。对于世人的迷信鬼神、崇拜偶像,佛法还进行了批评劝戒,认为上帝天神、地狱魔鬼不过是人的妄想。《楞严经》说:迷妄有虚空,因空立世界,^[18]所揭破的就是此理。至于佛家所立的各种事相,所说的各种话,是为了便于教导世人,使世人觉悟,并不执着于一事一词。人们只要彻悟佛法真义即可成佛成菩萨,而不必拘泥于一事一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19]。

佛化新青年接着就抨击非宗教新青年中的一些人才在搞迷信,认为这些人虽不迷信鬼神,但“迷信一个我”,迷信物质的我和精神的我。他们具体分析说,科学家已经证明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又是随死随生的。从这一点上讲,现在的我已不是先前的我了,这就证明了人的身体也即物质的我是“无常”的。而一些人对此避而不谈,执着于两种错误的定见:一是常见,认为只要不死,自己的身体就如常,身体的欲望就要设法去满足,从而迷信于美色、美声、美味。为了满足所迷,又对权力、钱财、名利产生迷信,终不免损人利己。二是断见,以为人活于世,不过几十年,终不免一死。什么灵魂、生死轮回都是假的,自己现在的要求欲望得到满足

才是真的,从而迷信于享乐、肉欲,“而不知这肉欲是假的……如电影戏,一幻就完事”^[20]。而迷信精神的我们,即执着于自己的一己之见,认为其他学说都是歪门邪道,从而故步自封,思想僵化不再进步。佛化新青年认为,多数非宗教新青年的迷信是这种对自我精神的迷信。而要破除对物质的我和精神的我的迷信,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学佛,因为一些佛法大义是专门破解人类心理迷妄的。佛家认为,心中有贪病的人,就会迷信名利权势;心中有嗔病的人,就会迷信暴力;心中有痴病的人,就会迷信文字语言、表面事物,以之为桎梏。佛学揭示完上述人类心理疾病,就开列“戒贪”、“戒嗔”、“戒痴”的药方进行治疗,以破除人们心理上的迷信,使人觉悟人生真谛。

佛化新青年最后总结说,世人认佛法为迷信,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迷信名相,迷信自我,不懂佛法真义。又习惯于以人代法,错认佛徒为佛法,而不知佛徒亦有真假之分,假佛徒大多迷信,而真佛法却是正信、净信、明信。值此 20 世纪,世界确实在发展进步,但佛法并不过时,更不会对世界发展起阻碍作用。总之,“世界之进步无量,佛法尤无量;……世界需大建设,佛则华严楼阁全现;世界需大解放,佛则圆满无碍,游戏神通。故真佛法者……是真幸福,是真文明,是真觉,是正信,是真无碍,是真精进,是真化境。”^[21]佛法不仅在 20 世纪不过时,而且会永世长存。

纵观上述非宗教新青年与佛化新青年的论战,前者认宗教为迷信,未免失之于偏颇;而后者完全否认佛教中含有迷信的成份,也欠公允。由于人类需要多种信仰来支持其精神生活,而宗教做为其中的一种为一部分人所需要,因此不能说它在 20 世纪已经过时,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宗教中所含的一些迷信成份又确实对一些人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其愚昧不明,从这个角度上,宗教也有其负面效应。至于宗教的这种负面影响在 20 世纪是否大到阻碍人类进步,阻碍社会发展的地步,我们认为还不至于,或者

说并非像非宗教新青年所说的那么严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多数有文化有知识的宗教徒都力图避免宗教与科学、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冲突,并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发展为己任。

2. 宗教对于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有利还是有害。

非宗教新青年认为宗教消极避世,人生观是出世而非入世的。宗教重视来世而轻视今生,只强调个人超脱而置世人苦痛于不顾。宗教徒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自己的家庭都缺乏责任感更不用说去改造社会了,而现代青年应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家庭要尽到抚养的责任,对国家要尽到纳税保卫的责任,对社会要尽到改造发展的责任。

佛化新青年认为,所谓“人生”,是指人类结合、协调精神与物质而成的生活;所谓“人生观”,是指人类去完成这种生活时所怀着的一种理想。^[22]而现在世上多数人的的人生观,都是在有限的人生里为自己求名求利,这并非正确的人生观。现代青年应当树立一种高尚的人生观,摆脱周围为名与利包围的小圈子,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里“作一种大丈夫的事业”,以大慈大悲之心去救济人类,救济众生,为社会兴利除弊。“如是存心,其责任岂同寻常么?果能如是,则其人格之高,真足以灭除一切纷争而有余。我们这个世界,岂不是成了一个‘极乐国土’么?”^[23]

非宗教新青年与佛化新青年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很激烈。双方都强调救世济人,都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在思想上应当不难沟通。之所以有分歧,主要还在于非宗教新青年认为宗教就是出世的,而看不到宗教随着时代的发展为适应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20世纪,更是侧重于入世,参与社会活动,而这并不妨碍其部分精神的出世,宗教在此时,越发能做到出世与入世相结合了。而宗教徒,特别是佛教徒,高扬大乘佛法“普渡众生”的旗帜,

更是积极入世,参与世事改造社会。佛化新青年们此时为了消除世人的歧见,干脆否认佛家真有出世、入世之区分。而在我们看来,出世入世的“世”,主要指的是现实社会。参与现实社会的主要活动,即为“入世”,反之则为“出世”。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活动而生存。这样一来,宗教人士的入世,实际上是“日用不离常行内,心思常游天地间”;而非宗教人士的入世,是“日用不离常行内,心思亦在常行中”。至于出世,不独宗教人士有此举,非宗教人士亦间或有此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明证,自古以来做隐士的,并非都是宗教徒。总之,出世入世并非宗教与非宗教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更不能以之为依据,评判宗教对于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有利还是有害。宗教徒入世后的主张、行为倒可以做为评判的一个依据。

3. 宗教对现代文明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非宗教新青年认为现代文化包含三方面内容: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精神文明。现代政治文明以“三权分立”、“民主宪政”为特征。强调“主权在民”,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现代精神文明即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就是“人人都不是征服阶级,也不是被征服阶级。凡属人类,没征服和被征服的分别。而且在正义道德上,并不用征服自己,去服从他人”。^[24]平等是指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有公正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使自己成功。平等还意味着“既不许哪一种阶级拥有特权,来压制自己。也不希望自己拥有特权,去压制他人”。^[25]博爱则指人不仅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爱人类群体。

非宗教新青年指责宗教用“先知”、“上帝”、“佛”来定一尊,以经书、经义为准则依据,强迫人们遵从信守。宗教还杜撰出魔鬼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使人心生畏惧,盲目信从,这与帝王专制的性质何其相似。“帝王专制,制人身体;教主专制,制人灵魂。同一

流毒人类,无可一日存者也。”总之,宗教对现代文明起消极作用,阻碍现代文明的实现与发展。

佛化新青年先谈了对现代文明的认识,继而指出其种种不足,认为佛法正可对其起补救的积极作用。

他们论述到,文明即“脱离野蛮状态而呈进化之现象也”。^[26]现代文明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文明的个人,文明的家庭,文明的社会,文明的国家。

他们指出,当今世人眼中的文明个人,即鼻梁金丝镜,口衔雪茄烟,衣冠楚楚,呼朋唤友大吃洋菜那种人。文明的家庭则是那种以夫妻为单位,夫妇二人容貌、地位、知识相当相配,通过自由婚恋组成的家庭。文明的社会,即街市繁荣、房屋整齐、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有学校、公园、自治机关、娱乐场所,有熙熙攘攘的市民往来其间的社会。而文明的国家即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内政外交文治武力均很兴盛,兵强民富的国家。佛化新青年认为这四种现代文明都不完善,都有其弊病。

文明的个人的弊病表现在这些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华衣美食,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多数“不过一饭桶而已,一衣架而已,尚有何价值之可言乎!”^[27]文明的家庭的不足,在于夫妇之道不立,男女感情难以持久。佛化新青年分析到,现代青年组织文明家庭,是从自由恋爱开始的。男女之间交际频繁,或游玩或看戏或跳舞,费尽心机地挑来选去,感情早已不纯了,动机也带有功利性。好不容易结婚了,又因为人格不齐,难免有一方借口自由婚姻而弃旧纳新。只讲自由不讲修养,怎谈得上建立真正文明的家庭。至于文明的社会,佛化新青年认为它实质上指城市文明。他们指出城市过于喧闹,使人不得安宁;空气污浊,烟气扑鼻,使人呼吸不畅;电灯等电器固然便利人群,然而触电而死的人很多;汽车电车虽然快捷,然而压死撞死的人也不少。至于城市中某些人的自私、阴险、狡诈、无耻,“凡与文明程度之高下成一正比例”。文明国家的弊

病,在佛化新青年看来也有多种表现:在选举上表现为参选人或以金钱,或凭势力,或以酒食,或靠口舌到处许愿拉选票,而一旦当选,即自食其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在行政上表现为官员罗致私人、互相标榜、挥霍民财、索贿受贿;在司法上表现为法规繁多,手续繁重,使人动辄得咎,“是以文明国家之人民,其犯罪者极多。固不若深山蛮民之优游自在,泰然自足,而得乐其所乐也”;在外交上表现以强权为公理,以武力为后盾,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国际公法被弃之不顾,国与国之间残酷杀戮,“是直兽类搏斗之行为耳,尚有丝毫人心哉!”

佛化新青年认为上述种种现代文明的弊病,在根本上是由贪、嗔、痴这三毒引起的。这三毒使世人的本心本性昏乱迷失。贪导致人类非善,嗔导致人类非美,痴导致人类非真。非善非美非真的人类使现代文明成为残酷竞争的“伪文明”。而佛法力倡戒除三毒,反省自身,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可见真正的现代文明只有以佛法为指导才能建立起来。

对于非宗教新青年所说的现代精神文明,即自由、平等、博爱。佛化新青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佛法不仅不与它们矛盾,反而会对它们起查漏补缺的积极作用。

他们指出,佛祖早就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28〕}这就说明佛祖对世间生灵一视同仁,爱人亦爱其他生物,这难道不是更彻底的博爱吗?佛祖又说自己是已成佛,众生是未成佛,没有什么上下阶级之分,神人贵贱之别,众生都是平等的,这比世人所说的平等彻底。

佛化新青年的代表人物邢定云则对“自由”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人们只有遵从佛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说:从字面上讲,“自”者“我”也;“由”者“从”也;“自由”者从我,不受一切外力的限制也。现在欧美人和一些国人常以自由标榜自己,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自由。首先,他们在制度上不自由,总得受某种制度的限

制。欧美人士和国人都曾通过革命手段解脱旧制度的限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旧制度虽去新制度又来,人们仍无法享受自由的幸福。其次,他们在职业上不自由。人们为谋生不得不从事各种职业,也就不得不受某种职业的限制而不自由。最后,他们在自然界中也不自由,这是他们诸种不自由中之最不自由者。这种不自由又可分为三类:时间上的不自由,时间一去不复返,他们想自由地留住时间,想永远年轻不想衰老都是不可能的;空间上的不自由,风雨水火不是其能任意趋避的,山川河海不是其能任意越过的,天灾地震也非他们能任意避免的;自身上的不自由,他们处在自然界中,饥则思食,渴则思饮,寒则思衣,劳则思居,生老病死皆不可免。从以上诸种不自由看,标榜自己自由的欧美人士和一些国人,根本就不自由。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呢?邢定云解答道:“自”者“真我”也;“自由”者,真我独尊,不受任何束缚也。^[29]那么,“真我”又何解呢?邢定云说:“真我”即灵性、智慧。它实在而广大,与天地比寿,与日月同辉;它是觉悟的源泉,是宇宙的中心;它不变化不生灭,天地间惟它独尊。邢定云所说的“真我”,颇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养成了“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的“我”^[30]。这种“真我”,实际上指佛家所说的“本心”。邢定云认为:真我既然是不受任何束缚的,那么人本来也就是自由的。只不过人被各种虚幻事相所染所迷,才找不到“真我”之所在,只是一味向外追求“由乎物”的假自由。人只要直指本心,找到“真我”之所在,就能获得“由乎己”的真自由了。而要找到“真我”之所在,只有学习佛法,彻悟本心本识。

佛化新青年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31];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涅槃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

满地,世成吉祥”^[32]。

最后,佛化新青年强调指出,佛法对现代文明是起积极辅助作用的,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33]。

对于非宗教新青年和佛化新青年的上述争论,我们有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非宗教新青年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在搞“精神专制”,都是反自由反平等的,这种认识不太确切,有些以偏概全。因为虽然从世俗制度上讲,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由于源自古代,长期受封建专制的熏染而存在着等级区分。但在教义上,佛教却与等级尚存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很大差别。佛教不设什么世间唯一绝对的真神,不认为神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它实质上以人为中心,因此它确有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本主义思想。

其次,佛化新青年对现代文明各种弊病的揭破是比较深刻的,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所立的东西仍是在他们看来无所不能的佛法。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指出他们作为宗教徒的狭隘之处——他们始终想以佛教定一尊。他们的这种做法,可以说与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赞同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等现代政治文明的人士,彼此之间对于这种政治文明的认识和看法基本一致。但对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精神文明的认识,赞同者之间也并不一致,直到现在还在探讨其内涵和外延。从这个角度看,佛家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对人们不乏启发借鉴的意义。

4. 科学、教育、哲学同宗教的关系。

非宗教新青年认为,科学是学问、是事实,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34]。教育、哲学也都是理性的东西。它们同感性至上的宗教根本是不相容的。

佛化新青年承认现在世界的大势,是科学、教育、哲学思潮的

大流行。但接着就指出这几种时代大潮还有其缺陷,并质问:“我们不是以求‘知’的目的去研究哲学吗?究竟所求得‘知’的方面的东西(如人生问题、宇宙问题),真能使我们满意没有?我们不是以求‘用’的目的,去研究各种的科学吗?究竟所求到‘用’的方面的结果,真能使我们得着一种没有缺陷的东西没有?”^[35]

他们认为科学固然能使人类物质文明昌盛,但由于人类间的残酷竞争,科学成果也能成为人与人之间血腥杀戮的工具,如炸药、潜艇等的应用于战争就是明证。这样就造成“科学愈进步,则杀人之利器亦愈巧,人民之死亡亦愈多”^[36]。人类间的竞争也越发残酷凶暴,“令人不能不归咎于科学之罪过矣”^[37]。

他们认同教育是文明的源泉,教育可以开启民智。但认为教育“实属慈善事业之一种,其成功者根元在爱”。真正的教育家应该具有彻底的博爱精神,应该没有种族、国家的区分,并不为某一人、某一国、某一族谋私利,而愿为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幸福。但现在的教育家大多做不到这几条,这就为野心家们所利用,“而从事于争斗之准备”,成为残酷竞争的工具。

至于哲学、哲学家,佛化新青年认为这两者也有很多缺陷。他们指出现在哲学门类繁多,哲学家又大多“各持门户之见以相抨击”。这就使得世人无所适从,搞不清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非真理。哲学也因之无法起到开启民智,使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作用。而精纯的佛法正可以弥补当今哲学的这一重大缺陷,使世人的思想有所依从。

论述完科学、教育、哲学的不足后,佛化新青年指出佛学与科学、教育、哲学并不对立。一些人以为“科学家必诋佛法为迷信鬼神,思想家必诋佛法为束缚思想,教育家必诋佛法为迂远妄诞”,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佛法可以调和统摄科学、教育、哲学,“且三家者尤必待佛法之调摄,方能植善因于社会,而后世人乃得蒙其福利也”^[38]。